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莫砺锋 钟振振

主编：刘明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何宗美 黄大宏 熊宪光

胥洪泉 袁济喜 周英斌



内容提要

公安派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诗歌派别。本书第一次全面考证公安派的结社和文学活动，在此基础上归纳它的文学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公安派结社资料汇编”从各种相关史料中全面梳理汇集公安派各次结社的详细资料和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考证认识一个文学派别的基础性工作。“公安派结社考证”在资料梳理基础上，对公安派结社进行详细的考证，澄清了以前相关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认识误区和模糊认识。“公安派结社综论”考论公安派的总体情况、文学创作活动及实绩，论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书作者学风严谨，全书结构严密，论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考证基础上，是充实、丰满的学术论著。

总序

刘明华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重庆市重点学科。本学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教学、科研方面，都是一支影响颇大的重要力量。

本学科从198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魏兴南、曹慕樊、林昭德、徐永年、郑思虞、李景白、谭优学、荀运昌、秦效侃、熊宪光、徐洪火、刘明华等教授至今已培养出百余名硕士，其中有30余人考取兄弟院校的博士生。他们大多已成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或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如戴建业、巩本栋、陶新民、张瑞君、张立伟、韩云波、王明建、何宗美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本学科在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老一辈学者中，谭优学先生的唐代诗人行年考，曹慕樊先生的杜甫、苏轼研究，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研究，徐永年先生的唐诗研究等，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和声誉。由此而形成了本学科在以杜甫研究为重点的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传统。魏兴南、





熊宪光教授在《史记》、《战国策》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先秦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和优势。而年轻一辈的学者们，在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本辑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就有以现代小说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向的拓展，本学科的成员在文人结社、流民文学、文体研究、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已经或即将陆续发表。与此相关，本学科成员目前承担的各级各类重要项目，有力地支持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一批富有锐气的博士加盟本学科，为学科发展增添了活力。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陆续出版的丛书，本学科同志近年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学科在本科教学中素有优势，并不断继承传统，有所发扬光大。在教学成果方面，已数次获得学校和省市的优秀成果奖。2004年，本学科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申报获准“中国古代文学”为校级和重庆市的“精品课程”，并推荐教育部备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正是对本学科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综合成就的肯定。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



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本丛书的出版,只是本学科几十年学术发展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而已。既不是开端,更不是终结。可称得上是近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部分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套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将陆续推出。为展示本学科的传统,老一辈学者未刊的重要成果,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在学校和文学院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重要学术会议。作为重庆市的重点学科,还负责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对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学科长期得到学术界的前辈、师友和同好的支持。希望,也相信这样的支持会继续,因为我们对学术都怀有敬意和热情。

谢谢学校和重庆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构筑文学史的坚固基石

陈洪

两年前，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出版。很快，就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两年的时间弹指即过，这本《公安派结社考论》又放到了我的面前。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出版时，宗美请我作序。我写了一些读后的感想，主要的意思是，欲深入了解各时代的文学，不能不了解当时文人的生存与活动情况，而对文人结社的研究正是打开一扇视野开阔的窗子。如果说，宗美前一部著作已经从这扇窗子里看到一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的图景，那么本书则是调整焦距，把局部拉近后的细部放大图，也可视为前者的续篇。

明代文学的研究，向以公安派为一个突出的重点。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思想渊源，乃至“三袁”之间的同与异，“三袁”前后期的相续与蜕变，等等，都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对于“三袁”及其友人的文学或更宽泛意义上的交游，似尚缺少系统深入的梳理与讨论。宗美的研究正是对此做出了填补空白式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既可以深化上述种种问题的讨论，也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晚明士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特别是对于公安派之所以成为一个影响广远的文学流派，这方面的材料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因此，可以说宗美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都是在为文学史构筑更宽阔、更坚固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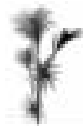
近些年来，学风问题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克

隆、注水等恶劣的风气败坏着学术的声誉。就在浮躁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宗美潜心凝虑，踏踏实实走自己书的路。正如韩昌黎所言，不诱于势利，不期乎速成。结果呢？学术的果实总是向着勤奋的人、诚实的人微笑。

在他自己开拓的这片学术园囿中，宗美已经有了可观的收获；不过据我所知，他的蓝图远不止此。让我们等待下一个金秋的到来吧。

前 言

明代文人结社的现象异常活跃,影响十分广泛。当时的文学派别、思想派别甚至政治派别往往伴随着文人集团之兴而兴起,与文人结社有着密切关系。在明代文学领域,文人结社现象尤为多见,结社对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影响至为突出,人们所熟知的台阁体、茶陵派、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在其背后无不存在一个有较大规模的文人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往往涵盖若干个大小不一的文人社团,这些社团从横向来看便在不同的地域彼此间形成相互响应之势,从纵向来看则前后承袭,发展或维系其势力和影响的存在。所以,明代的文学流派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构成它的社团促其诞生,并由它的文人社团促其向着当时的现实时空不断延伸而取得发展。而反过来说,当其所属的文人社团消歇时,那么它的衰亡之日也就接踵而至了。这样一来,明代文学流派之兴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可以归结到文人集团、文人结社之兴衰,尽管当时社会文化的背景因素和文学思潮的内在机制等方面都发生着重要





的作用,但文人社团的影响是绝不可忽视的。

文人结社研究是切入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明代文人结社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对社团的考证、梳理,包括考察其成员组成、活动内容、兴衰过程及其影响等;二是将结社与明代文学运动结合起来加以审视,将作家个案研究置于文人群体的整体视野中进行分析判断,从而既深化对文人结社本身的研究,也促进作家个案、文学现象和整个明代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新认识。相对于明代异常兴盛的文人结社现象来说,迄今为止学界对它的研究还显得不够,而在有限的研究中通常偏重第一方面的研究,第二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被忽略,但明代文人结社研究的真正意义则在于第二方面。

明代文人集团与文人结社决定了明代文学以特有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史上,同时也规定了明代文学研究在视角、方法上的特殊性。这突出表现在,离开文人群体的作家个案研究往往难尽人意,单限于某一文学流派范围之内去研究这一流派同样面临着困难,所以,整体中的个体研究,宏观中的微观研究、群体研究、交叉研究、作家关系研究等等,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虽也是需要的,而在明代文学研究中则尤为重要。这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①在明代,文人社团就是作

① 《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5页。

家所隶属的一个“总体”，这个总体深深地影响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所以，明代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个体，而且要研究“总体”，并从“总体”中去研究个体，从而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大视角的开放性研究。

本书先不打算对明代文人结社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而是仅就公安派结社作一专门的考察和研究，旨在一方面以此个案显示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特别是文学流派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为公安派研究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关于公安派结社，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和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都已有所涉及，但未作专门研究。拙著中考得公安派结社 9 例，并在第二章的《晚明思潮与文人结社》一节从禅悦之风对文人结社影响的角度对公安派结社作了一些论述，其篇幅约为四千字，因受到全书总体框架的限制，既未一一详考，论述也未能作过多的展开。此书出版后，原打算专作一篇《公安派结社考论》，但经过一番资料搜罗发现，问题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得多，结果只好将正在进行的《复社论稿》、《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研究》暂时悬搁下来，转而投入到公安派结社的探讨和研究之中。

研究显示，公安派结社的现象十分突出。其特点在于：其一，数量多，达到 30 多例；其二，持续时间长，从万历八年到天启元年共为 40 多年；其三，地域分布广，在公安、沙市、武昌、京师、金陵等地皆有结社活动的开



展；其四，入社者众多，形成规模较大的文人阵营，成员具有广泛性，尤以士、僧合流为特色；其五，社团类别多样化，文社、酒社、诗社、诗禅社、法社和临行时大社等不一而足，比其他文人群体结社更具丰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

研究也显示，公安派结社之兴衰与公安派之兴衰息息相关。万历八年的阳春社标志着公安派的萌生，十六年袁宗道与憨山大师以及董其昌、唐文献等人结社体现公安派文人影响的扩大，二十年的南平社说明以龚氏父子和袁氏兄弟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群体正式形成，二十二年“三袁”聚首京华与董其昌、陶望龄、王图、萧云举、陈所学、王一鸣、汤显祖等人的都门结社表明公安派已走出公安而进入最为核心的地区，二十五年冬以后发展壮大起来的蒲桃社则既是公安派结社的高峰也是公安派发展的顶点。二十八年公安派结社因袁宗道之逝和袁宏道居乡由京师移置公安，两年后发生李贽事件，黄辉谈禅结社被弹劾，蒲桃社最终解散，与此同时因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在公安“山居”前后达6年之久，社事虽仍不辍，但因地域限于公安及附近地区，以致公安派结社和公安派本身的影响重新回缩到了公安。所以袁宏道山居6年时期的结社不仅是公安派结社的转折点，也是公安派的转折点，此后虽袁宏道与其弟再入京师结社开展文学活动，袁中道在南京也曾三举大社，但其势力已远非能与蒲桃社时期相比了。三十八年九月，作为公安派结社盟主和公安派旗手的袁宏道亦如其兄英年早逝，三袁惟中道一人尚存，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人生被定格在静养山林、聊度时日的

格调上,结佛会、念佛诵经以求得安顿,如此达数载之久。四十四年,袁中道进士及第,算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却已不能成为公安派由衰转盛的契机,因为这时的他已年近半百,离去世只有8个年头了。所以,尽管中进士后的袁中道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结社活动也显得更为活跃起来,京师海淀诗会、徽州松萝社、南京结社都有他的参与,但公安派社局和公安派就如同袁中道的生命一样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时期——这是公安派结社的兴衰简史,也是公安派兴衰的大致历程。

公安派结社研究还显示,结社对公安派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张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结社促使公安派文人阵营和公安派作家群得以形成。关于公安派的成员构成,学术界仍缺乏明确的考辨,众所周知的公安派究竟包括了多位作家,是十位、二十位,还是多少,这些作家在公安派中各处在怎样的位置,担当怎样的角色,他们的思想、文学观和创作风格有何同有何异,同者始于何时,异者又以怎样的情形存在,等等。既然是一个文学流派,显然构成它需要一个有一定规模而又彼此呼应的阵营,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否则何以成流派?因此,我们对于公安派成员的了解是不能满足通常所说的那十来人已。在此,不妨将公安派文人阵营与公安派作家作一区分,前者范围大于后者,凡参加公安派文学唱和活动并且支持甚或不反对公安派文学主张的文人皆可入其列,这其中有些人不一定留下过多少作品,他在流派中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创作而在于他在流派形成过程中他的存在,例如龚大



器、袁士瑜或许可以不称他们为公安派作家，但他们却是公安派中的重要成员。这其中也有些人先参与过公安派的活动并受到公安派的深刻影响而后来另入一途，如钱谦益、钟惺，虽绝不能称他们是公安派作家，但一段时间里他们却毫无疑问是公安派文人阵营中的成员，假如袁宗道、袁宏道不英年早逝，假如晚明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不发生巨变，假如公安派在文学革新方面能不断迎合新的时代发展和文学不断变化的需要，他们很可能也就自始至终属于公安派阵营之内了。公安派文人阵营具有广泛性、多层次性和变化性，凡参与公安派交游、结社及文学活动的文人基本上属其列，人数在百人以上，这一阵营是构成公安派的“塔基”，而这个塔基主要有赖结社的渠道和方式得以形成。而作为狭义的公安派作家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较大的，如“公安三袁”、黄辉、江盈科、陶望龄、雷思霈等，还有一些人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显重要，但在当时对公安派的形成却起了相当的作用，如龚仲庆、龚仲敏、龚仲安、李学元、王以明、丘坦、王一鸣、方文僎、王图、萧云举、顾天竣、李腾芳、潘士藻、苏惟霖、陈所学、陶孝若、曾可前等。这些人皆与“三袁”结社唱和，多数人还为社中骨干。

同时，结社成为“公安三袁”扩大公安派势力和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影响的重要方式。“公安三袁”在结社过程中不仅注意与文学主张相同的文人广泛交游，也重视与最初文学主张并不一致的文人往来。潘之恒早年入汪道昆白榆社，师事王世贞，并得其赏识，袁宏道不以此为涇渭，相反而是从潘之恒“出汪、王之门而不

入蹊径”^①找到结合点,把他拉入公安派阵营,成为唱酬密切的社友和诗友之一。袁宏道将潘之恒诗集 20 卷删定为 7 卷的《涉江诗选》,其目的不外通过这部诗选把潘之恒“打造”成公安派诗人使之以崭新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文坛。虽然后人对于潘之恒有所谓“随人作计”^②的微词,但他在与“公安三袁”交游的时期无疑完全是公安派中的一员。再从他的《二袁别集序》对已逝的袁宏道的情感来看,“随人作计”的说法恐怕也须作客观的分析。公安派社友中另有龙膺、梅守箕、谢肇淛、吴稼登、吴皋倩等人也都曾追随过复古派,其中吴皋倩是复古派代表人物之一吴国伦之子。这可以看出,公安派结社具有广泛的接纳性,而正因如此才壮大了公安派的力量。

当然,结社对公安派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结社谈禅虽然有益公安派思想个性的形成,对公安派文人思想解放也不无好处,但佛禅在诸多方面也显示出对公安派发展的不利作用。首先,在晚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下过于耽于佛禅不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导致政治的干预而使公安派受到打击也就在所难免;其次,佛禅成为公安派文学中最基本的内涵,这就意味着公安派的追随者必须在佛禅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才能成为公安派的真正承传者,而事实上自袁宏道之后几乎没有人在禅学上的修养再达到袁宏道的高度,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公安派后继无人的事实。从袁宏道讥张献翼看不懂自己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八《涉江诗选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八《涉江诗选提要》。



的诗文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公安派的作品其妙处不在文字而在禅意禅境，故这一方面需要有相当水准的人才能深有领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真正理解公安派作品都不可能，又何以谈将公安派发扬光大呢？不说他人，就是袁中道在其兄逝后也很难将公安派的旗帜再打下去，势单力薄是一方面，而袁中道禅学修养不及其兄也是重要的原因，袁中道自己也说其才不如其兄、胆亦不及其兄。这就等于说他已无法维持其兄在时的格局，究其原因就是通常所说的“非不为也乃不能也”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派之兴在于禅作为其思想的法宝，其衰则在于禅这一法宝已无人能传承。佛禅的消极影响还在于，当结社完全以念佛、诵经、参禅为目的的时候，必然导致作家思想锐气的消解和文学才华的萎缩，像华严会、金粟社几乎成了佛教信徒宗教性活动的团体。此外，酒色与过于频繁的应酬也给公安派带来了直接的不良影响，疾病、死亡与结社的关联性深刻地反映在公安派作家的心态与创作之中。

本书在体例上采用塔式的开放性结构。作为塔基的最底一层是“公安派结社资料汇编”，其作用是支撑它的上层即“公安派结社考证”，而考证部分又支撑再上一层的“公安派结社综论”，塔尖则属简短的“前言”部分。由下而上视之，一层支撑一层，由上而下视之，一层统领一层，从而构成一个既独立自存又环环相扣的开放性整体。所谓开放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还在于它是向读者和同行专家“开放”。本书将有关材料搜罗、汇编，并一一标明页码。疏漏之处，可赖饱学之士补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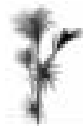
足；材料验证观点而失之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祈请大方之家不吝指教；对于有兴趣对公安派结社作深入探讨的同行，本书则已提供免于搜罗之繁、考证之苦的一点方便。

感谢陈洪师和熊宪光师对此书的大力支持。我在西师时受业于熊宪光师，在南开时忝于陈洪师之门，二师如东鲁春风，惠我实多。这次熊宪光师不辞辛劳为我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陈洪师欣然赐序，对弟子的浓浓关爱和殷切提携见于字字句句之中。

何宗美

2004年10月16日

子夜于西师悠然居



目 录

总 序 刘明华(1)

构筑文学史的坚固基石 陈 洪(1)

前 言 (1)

上 编

公安派结社综论

一、公安派结社的发展演变及兴衰因素 (4)

二、公安派结社的成员结构及地域分布 (15)

三、公安派结社的类别及特征 (24)

四、公安派结社的活动内容及文学创作 (31)

五、公安派结社的影响 (39)